

那处圣洁的高地

——访乌克兰卫国战争纪念馆馆长阿尔乔莫夫

谭武军

面对面



阿尔乔莫夫馆长。 谭武军摄

乌克兰卫国战争纪念馆坐落在基辅第聂伯河右岸的一片丘陵地上。这里地势高峻,草木葱茏,又毗邻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彼切列修道院,堪称是一处圣洁的高地。纪念馆馆长亚历山大·阿尔乔莫夫身着戎装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年过七旬的阿尔乔莫夫是一位有中将军衔的老兵。1994年,他从乌克兰边防军副司令之职卸任后,即担任纪念馆馆长。

“乌克兰卫国战争纪念馆是乌克兰规模最大、展品最丰富的博物馆。”阿尔乔莫夫馆长自豪地说。纪念馆落成于1981年5月9日,占地10公顷。这是一组气势宏伟的雕塑和建筑艺术群,其中最醒目的是高达62米的“祖国母亲”雕像(见右上图,谭武军摄)。一位身着乌克兰民族服装的母亲,右手执剑直指蓝天,左手高举一面刻有苏联国徽的盾牌,屹立在第聂伯河之畔,神情庄重,凝视着东方。馆长说,“祖国母亲”之所以面朝东方,是因为苏联红军当年是从东面入城解放基辅的,这座象征乌克兰人民保卫祖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的雕像,据说是世界四大雕像之一,也是基辅市的标志性建筑。

“祖国母亲”雕像前是一个宽阔的广场,每年5月9日,政府都要在这里隆重举行反法西斯胜利日庆祝活动。广场四周的群雕作品,反映了乌克兰人民英勇抗击德国法西斯的历史场面。部分群雕位于广场尽头的山谷里,那里装有几个扬声器,反复播放着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流行的爱国歌曲。当游人走进山谷,置身群雕之中,听着悲壮的歌曲,脑海里便会浮现出战争年代的场景。

“祖国母亲”雕像的基座是个圆形堡垒式建筑,这就是卫

国战争纪念馆。纪念馆共分三层,展出面积5000平方米,30万件藏品中,有1.5万件常年对公众展出。

走进纪念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尊尊扛着钢枪的苏联红军战士的铜像,铜像四周的花岗岩石上刻有1152支参加过解放乌克兰战斗的部队番号,以及252支乌克兰游击队的名称。纪念馆的参观路线是根据战争进程设计的,战争路线图将“战争爆发”、“基辅保卫战”、“纳粹占领制度”、“乌克兰人民的反法西斯运动”、“解放乌克兰”、“彻底战胜德国法西斯”等12个专题贯穿在一起。尽管纪念馆突出介绍了乌克兰战场的情况,但对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库尔斯克大会战等著名战役也有专题介绍。观众一路走来,可以了解波澜壮阔的苏联卫国战争全貌。

馆内展品丰富多样。有反映纳粹德国血腥暴行的,如用人皮制作的手套、人油制作的肥皂,纳粹集中营使用的人骨粉碎机;有历史风云人物的个人物品,如当年任高加索方面军步兵旅政委的勃列日涅夫的军官证、苏联元帅朱可夫的军礼服,曾击落62架敌机、名列苏军空战英雄榜榜首的乌克兰飞行员阔日杜布的家书等;还有讲述普通百姓战争经历的感人故事。

13号展厅中有苏联红军出兵东北给侵华日军最后一击的专题介绍。阿尔乔莫夫骄傲地说,在日本无条件投降签字仪式上,代表苏联政府在受降书上签字的杰列维扬科中将是乌克兰人。他说,乌中两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结下了深厚友谊。1937年中国抗战爆发后,不少乌克兰飞行员参加了苏联援华志愿飞行队,帮助中国抗击日本侵略者,有的甚至牺牲在中国战场。整个抗战期间,共有14名苏联飞行员获得“苏联英雄”称号,其中有2位是乌克兰人。在纪念馆的国际主义展厅里,收藏有当年中国政府颁发给志愿航空队飞行员的奖状和成都空军机械学校赠送给苏联教官的飞机模型等。

最令参观者心灵震撼的是14号展厅。展厅左侧的墙壁上悬挂着6000多幅战争亲历者的照片,右侧的墙壁上挂着上千幅在战争中失去子女的英雄母亲的照片,展厅中央的长桌上摆放着600多张苏联红军烈士的死亡通知书。

阿尔乔莫夫说,卫国战争中,有800多万乌克兰人牺牲,200多万人被抓到德国服劳役,他们中的每一位都不应被忘记。1994年,纪念馆增设纪念馆,就是为了突出人民是伟大胜利的创造者这一主题。阿尔乔莫夫母亲的照片也陈列在展厅中。这位慈祥的乌克兰扎波罗热农村妇女在战争中痛失两位



亲人:1941年秋天,丈夫谢尔盖在抵抗德军入侵的战斗中失踪;1944年,长子弗拉基米尔在解放拉脱维亚的战斗中壮烈牺牲。在失去至亲的岁月里,这位坚强的母亲默默承受着家庭的重担,并让孩子们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还有一位叫斯捷潘诺娃的英雄母亲,先后有7个儿子在与德寇作战中不幸牺牲;另一位叫李森科的英雄母亲,有10个儿子参加了苏联红军,而且无一在战争中阵亡。两个英雄母亲家庭的照片并排而立,令人感慨万千。

光厅是纪念馆最后一个展厅,也是唯一以白色为基调的展厅。展厅四壁白色大理石上,镌刻着12000名苏联英雄和201名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名字。展厅穹顶的巨幅彩绘生动地描绘了历经战争劫难的人民欢庆胜利、喜迎亲人、祈愿和平、筹划未来的动人场景。

透过宽大的落地窗,英雄之城基辅尽收眼底。灿烂阳光下,战火与硝烟已成为历史中一段久远的记忆。“和平是脆弱的,牢记历史才能珍惜和平。”临别前阿尔乔莫夫发出的慨叹让我陷入长久的深思。

艾特马托夫的文学世界

陈志新

2008年6月14日,吉尔吉斯斯坦为著名作家钦吉兹·艾特马托夫举行国葬。在近40摄氏度的高温下,2万多民众为作家送行。总统巴基耶夫致悼词说,艾特马托夫是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形象的代表,向世界展示着吉尔吉斯民族的文化与传统。

作为吉尔吉斯斯坦当代文学的泰斗,艾特马托夫的作品被译成上百种语言,传播到100多个国家。

艾特马托夫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30多年前,他的中篇小说《白轮船》一进入中国,就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如今,他的作品几乎都有了中译本。1989年夏,艾特马托夫曾访问中国,此后重访中国成为他一直的心愿。他曾经打算到新疆拜访他同一民族(中国称柯尔克孜族)的90岁的《玛纳斯》史诗演唱者居素甫·玛玛依,不想此愿终未实现。

艾特马托夫的文学创作灵感孕育于家乡的高山峡谷之间,源自于他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和对人性的深刻思考。1928年,艾特马托夫出生在吉尔吉斯斯坦塔拉斯山区的一个小村庄里,那里是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流传着许多神话、寓言与传说。9岁时,父亲在肃反运动中蒙冤被害,艾特马托夫过早地感受到了现实生活的艰难,青少年时代卫国战争爆发,他经历了战争的残酷和痛苦。正如作家自己所说,这段时光促进了他对民族文化、民族性格和人性特点的认知,奠定了他人生的基础。

1958年,艾特马托夫自莫斯科高级文学培训班毕业后,在《新时代》杂志发表了中篇小说《查密莉雅》,由此跻身苏联文学界。此后,他的小说《第一位教师》、《我的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骆驼泪》、《大地—母亲》、《永别了,古利萨雷》等作品相继发表,并于1968年获得了苏联文学最高奖——列宁文学奖。在这些作品中,无论是描写冲破传统羁绊、追求幸福爱情的查密莉雅,还是克服世俗阻碍、教书育人的乡村教师,或是面对生活不幸、始终坚忍博爱的母亲,以及遭遇误解不公但对信仰执着依旧的共产党员塔纳巴伊,作者都将他们作为普通的吉尔吉斯人来书写,以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刻画和塑造了苏联社会主义大发展时期普通民众的善良、正义与慈爱的形象,给人以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

受俄罗斯传统文学影响,艾特马托夫上世纪70年代的作品开始注重对人物心理过程的描写。《白轮船》和《花狗崖》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作者运用浪漫主义的抒情手法,以接近于神话和寓言的形式,通过细腻和诗一般的语言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反映出善与恶、美与丑的斗争。《白轮船》讲述了一个被父母遗弃的吉尔吉斯小男孩的故事,全书充满了“艾特马托夫式的忧伤”,有人说艾特马托夫的文字像音乐,总能触动人们心底最隐秘的情感。作品在描写小男孩因为长角鹿被杀而准备投河时写道:“你好,白轮船!你好,爸爸!是我,你的儿子,请把我带上白轮船,一起走吧……”

进入上世纪80年代,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社会与经济问题日渐凸显,人们陷入理想与现实巨大的反差之中。在此背景下,艾特马托夫开始对现实生活与人类精神领域进行哲学性思考,先后发表了中篇小说《一日长于百年》和长篇小说《断头台》。《一日长于百年》是作者通过现实、传说和科幻三个层面对人类生活的描述,从人与世界的多角度联系中深刻表达对人类命运的强烈关注和哲理思考。艾特马托夫因这部作品获得了哲学作家的称谓,并成为苏联文学界默认的领军人物。《断头台》是艾特马托夫的巅峰之作,作品讲述了人与狼之间的悲剧性故事,触及了当时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的吸毒、犯罪等丑陋现象,首次提出人类发展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表达了善与恶在人类发展过程中的尖锐矛盾与残酷斗争。

1988年,艾特马托夫开始了长达20年的外交官生涯。此间,他只发表了两部小说,《卡桑德拉印记》(1996)和《群峰颤栗之时》(2006)。对苏联后期以及解体初期社会生活与思想观念变化的思考折射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对创作的渴望。

艾特马托夫带着世人的赞誉离开了,所有受到他作品熏陶的人都为他的逝去惋惜。他曾在作品中这样写道,“如果有人死后,灵魂有所变,我希望成为白尾鹰,可以自由飞翔,能从空中望见永远看不够的故乡大地……”艾特马托夫的作品及其所表现的人性的善良、正义与人道关怀已然成为雄鹰,将永远在人们心灵中展翅翱翔。

《芬妮的微笑》幕后故事

王兆贵

2003年春天,中奥两国合拍的故事影片《芬妮的微笑》在中国和奥地利同步首映。影片取材于生活在浙江东阳一个小村庄里的奥地利籍女土格特鲁德·瓦格纳的真实故事。60多年前,18岁少女瓦格纳漂洋过海,从维也纳来到上海,寻找她在维也纳结识的恋人,从此跟随她的中国丈夫历经战争、动乱和迁徙,最后在中国的一个普通乡村无怨无悔地度过了半个多世纪。这段至死不渝的跨国爱情,感动了中国,感动了奥地利,很多观众是含着眼泪看完这部电影的。而这部感人至深的故事影片的原型脚本,就来源于奥地利知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格尔德·卡明斯基的著述。

卡明斯基是维也纳大学法律系教授,同时身兼奥地利联邦科研文化教育部局长、奥地利中国及东南亚问题研究所所长、奥中友协常务副主席等职。从1972年以来他70多次访华,并受到邓小平3次接见。为表彰他为发展奥中两国关系做出的贡献,奥地利政府授予他“各国人民友谊奖”,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授予他“人民友好使者”的称号。

卡明斯基发现瓦格纳的故事是在上个世纪末。一天,瓦格纳的弟弟找到时任奥中友协秘书长的卡明斯基,指着友协展示的上世纪30年代初中国警官在奥地利留学的照片说:“前排行数第二人是我姐夫,我急切地想知道我姐姐现在的情况。”卡明斯基非常理解他的心情,没过多久便匆匆飞赴中国,一路寻访到了浙江东阳,终于在湖沧村那幢古老的杜家老屋见到了瓦格纳。卡明斯基了解到一幕幕真相后,深受感动。既嗟叹人间竟存在着如此圣洁的爱情,又为奥地利有这样一位圣洁的女性而自豪。维也纳市长听了卡明斯基的讲述后,激动地说:“我还不知道我们维也纳有这样一位好姑娘,我们要请她回来参加国庆节,把她作为贵宾接待。”此后,卡明斯基多次来到中国,搜集、仿制和拍摄瓦格纳在中国农村的生产生活用具以及民间工艺品等,在维也纳举办了“瓦格纳生平事迹展”,实物、图片无所不有,并邀请瓦格纳前往维也纳参加开展仪式,随后又激情难抑地写出了瓦格纳的长篇传记《嫁给中国》(中译本为《苦乐人生》),奥地利总统为该书作序。1995年初,在卡明斯基的促成下,奥地利电视台和浙江电视台共赴湖沧,合作拍摄了瓦格纳的专题片,并在两国同时播放。同年9月,奥地利总统克萊斯蒂尔访华的第一天,中央电视台播放了这部专题片,中国百姓通过荧屏结识了这位热爱中国、忠于爱情的奥地利女性,雪片般的信函从四面八方飞向瓦格纳飞来。

除著有瓦格纳长篇传记《嫁给中国》外,卡明斯基还撰写了《罗生特在华手记》、《老上海浮世绘》等几部与中国历史和文化有关著作。此外,他撰写的《奥中友谊史》,已成为研究奥中关系的权威性文献。正是通过这些饱含深情的著述,奥地利国际主义战士罗生特、远嫁中国的奥地利女士瓦格纳,真实反映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生活的奥地利画家希夫等才得以传扬,奥中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才变得如此亲近。

不久前我们在奥地利见到了卡明斯基教授,近距离地接触更让我们体会到这位友好使者对中国人民的炽热情感。同事告诉我,卡明斯基是个中国通,于是我对卡明斯基说:“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原以为为这句半文半白的客套话他不一定听得懂,谁知他却马上接答:“哪里哪里,过奖了。”在座的人哈哈大笑起来。临别前,卡明斯基操着不太流利的中文与大家道别:“来,老乡,我们合个影,明年一我再到中国一去看你们。”

旅居悉尼数年,曾零距离观察澳大利亚人的邻里关系,印象最深的还是中产阶级聚居地所流行的那种既保护隐私又密切交流、既保持距离又加强联络、既结构松散又组织有效的“邻里聚会”。

何为“邻里聚会”?即街坊邻居在节假日里自行组织的聚会。

其实这个“邻里聚会”也没有什么固定模式,可以是闲聊,可以是唱歌,可以是跳舞,也可以是结伴旅游。不用领导出面号召,也不用物业牵头组织,纯粹是邻居们自娱自乐。一般说来,活动由小区里的热心人发起,除了事前在小区张贴公告外,还给每家每户发一封印制精美的信,告之聚会的时间、地点、活动内容、注意事项等等,让大家早作准备。

届时,邻居们便按照预先约定前往参加。临时有事来不成的邻居,则打电话致歉,并向各位邻居问好。

我居住的小区罗斯诺原是澳大利亚退役军官安置地,住着很多军阶较高的退役军官。但小区一年两次的邻居圣诞聚会(澳大利亚除12月末的夏季圣诞节外,还有一个7月末的冬季圣诞)却不由这些军官召集,而由一名精力充沛,房屋、庭院相对比较宽敞的北领地公务员出面组织。他在确定了参加人数后,便于聚会前一天开车去超市采购,聚会当天上午则在家里准备一些简单食物,到时间便在当街

闲话邻里间

的花园里摆上简易桌椅,放上茶、饮料等,恭候大家光临。下午3点,邻居们陆续进场,手上皆拿着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礼物及聚餐食物,如一只自制蛋糕,一瓶自制果酱,一盒咖喱牛肉,一袋茶鸡蛋等,待主人过目致谢后,便菜肴摆在桌上让大家分享。从下午到晚上,邻居们可以自由出入。而聚会除了吃喝之外,主要就是聊天,聊澳大利亚百年一遇的干旱,聊橄榄球比赛,聊澳籍好菜鸡星呢·基德曼的善举……而更多的则是聊家长里短,聊生活经验,聊“互相守望”,与邻居分享自己的苦和乐。

这种形式轻松、自在、随意、自然,且慰抚心灵、增进情感,故很多搬走的邻居在得到聚会消息后,仍驱车上百公里赶回来参加,不为别的,只为再见到老邻居。

也许是参加“邻里聚会”建立的友情,我家就常得到邻居们的帮助和点拨,比如割草、掏沟、打扫房顶、打理游泳池等,有的邻居甚至把自家花园里收获的瓜果、蔬菜送给我们尝鲜……这看上去很像中国传统的“远亲不如近邻”的关系,其实也不尽然,除了聚会时的“亲密接触”外,平时邻居们并不随便串门,有事皆有礼貌地敲门,站在门口说事由,未得邀请,决不踏进门内一步。邻居路上相遇,会热情地打着招呼、闲谈,但内容决不涉及人家的隐私。

不能说西方发达国家目前的邻里关系就是我们10年、20年后的样板,但人家好的东西却可以“拿来”。再说,社会发展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关键在于“为我所取,为我所用”。

从利马乘飞机一个小时就到达秘鲁南方的高原之城库斯科。从飞机上俯瞰,库斯科分布在东安第斯山脉丰饶的山谷中,阳光下,金色的土地与金色的房屋交相辉映,整座城市似乎都泛着金光。

库斯科是灿烂的印加文明的摇篮。在印第安语中“库斯科”的意思是“离太阳最近的城市”。传说远古时代,印第安人辛勤劳作,创造家园,于是太阳神赐予一把金拐杖。国王曼科·帕卡克遵循太阳神的旨意,从海拔4000多米的的喀喀湖迁到库斯科,建成雄伟华丽的都城,并以这里为中心,建立了面积达20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600万的庞大的印加帝国,创造了印加文化。从公元11世纪起,库斯科一直是印加帝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中心。

4月的库斯科,蓝天白云,草木青翠。巍峨壮丽的古建筑虽饱经沧桑,仍依稀可见昔日的辉煌。库斯科城内没有高大建筑,多为具有典型的西班牙或印加风格的马蹄形拱廊结构建筑,娟秀典雅;石块铺就的街道,古朴美观;身着花裙、头戴彩色圆形呢帽的印第安妇女不停地向游客推销着富有印加文化特色的小工艺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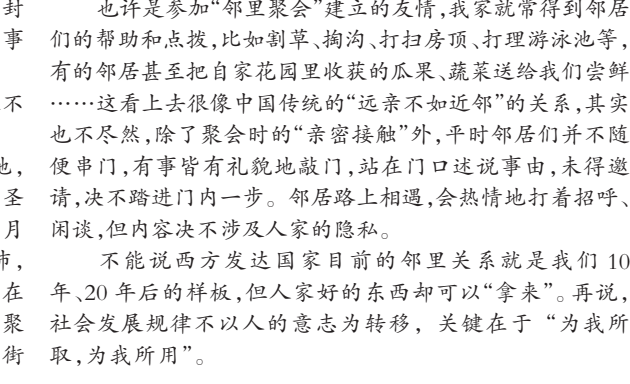
市中心的武器广场,北侧的帝国宫殿早被西班牙殖民者捣毁,取而代之的是始建于1560年的天主教大教堂。广场东侧的拉孔帕尼亚教堂建成于1668年,教堂内有绚丽多彩的绘画。广场四周西班牙式的带有拱廊的两层白墙红顶楼房,与周围的环境和谐统一,浑然一体。几条狭窄的石子铺就的街道呈放射状通向四方。

我们走进一条幽深的胡同,这里是著名的印加古道起点。据说,当年这条古道绵延数千公里,向上可通至今日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向下可到达今天的阿根廷和智利。古印加驿道穿越安第斯山,沿途开凿了许多隧道,架设了数座桥梁,构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交通运输网,被认为是人类最伟大的工程之一。

库斯科的太阳神庙是印加帝国最宏伟的建筑。历代印加帝王都居住在此。西班牙殖民者摧毁了这座神庙,在废墟上建立了圣多明各教堂。教堂里面,太阳神庙的部分石墙仍完好地保留下来,从这些遗物仍可窥见当年神庙的壮丽景象:经加工的花岗岩石块,或大或小,排列有序,石块与石块的结合处,不用任何黏合剂却严丝合缝,甚至连薄薄的刀片也插不进去。据说当年太阳神庙大殿的四周墙壁和屋

金色库斯科

祝寿臣



顶、地面全部镶上了一层厚厚的纯金板,所以,这座神庙又被成为“金宫”。祭坛上,有一个巨大的太阳神金像,周围环绕着无数的金线,表示太阳的光芒。它面向东方,当初升的朝阳照射进大殿时,就放射出万道金光。

库斯科作为印加帝国首都,有着严密的防御体系。城市的四周筑有四座古堡。我们沿着陡峭的盘山公路,来到最为著名的萨克萨瓦曼城堡。萨克萨瓦曼在印第安语中意为“山鹰”。古堡建在斜坡上,方圆4平方公里,有三重城墙作为屏障,外围墙高18米,周长540米,全部用灰色的巨石垒砌。估计使用的巨石达30多万块,最重的一块石头重360多吨。在生产水力水平极为低下的年代,古堡所用的巨石是怎样从采石场运来的,又是怎样加工垒砌起来的,至今仍是个谜。但可以肯定,它是古代印加人智慧和力量的结晶。

印第安人将太阳神视为众神之王,认为世间万物都是由这位“造物主”恩赐的。印第安人从公元15世纪前后开始举行一年一度的“太阳节”。时至今日,尽管人们对宇宙已经有了全新的认识,但秘鲁人对太阳依然有着特殊的依恋,每年6月的一天都在萨克萨瓦曼古堡举行“太阳节”,祈求太阳神在新的一年里保佑这里的人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夕阳西下,余晖中的库斯科城更加古朴端庄。站在萨克萨瓦曼古堡极目远眺,任思绪自由地飞翔,恍若回到遥远的年代,见证印加文明的灿烂辉煌。

题目:库斯科武器广场一角。祝寿臣摄

本版责任编辑 孙广勇 电子信箱 gjfk@pd.people.com.cn

国际副刊